

主 编 杨世钰 赵寅松
本篇主编 徐 琳

大理丛书·白语篇

卷 一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大理丛书·白语篇

卷一 白族语言文字研究文献选编（一）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族语言文字研究文献选编. 1/徐琳主编.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8. 9
(大理丛书·白语篇)

ISBN 978 - 7 - 5367 - 3879 - 9

I. 白… II. 徐… III. 白语—研究—文献—选编 IV. H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3515 号

DALI CONGSHU · BAIYUPIAN

大理丛书·白语篇

徐琳/主编

策划编辑 高力青 岳 坚

责任编辑 奚寿鼎 段 波

封面设计 何志明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刷 云南地质矿产局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总 印 张 224

总 字 数 6000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 ~ 1060(套)

ISBN 978 - 7 - 5367 - 3879 - 9/H · 140 定价: 3660.00 元(共 5 卷)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序 二

马 曜

中华文明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共同创造的。文明一词既是指文化，又是指与“野蛮”相对的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周围地区在云南古代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海门口为标志的殷末洱海文化向东发展形成以石寨山为标志的战国到西汉的滇文化。在滇文化基础上吸收东来的汉文化，又形成滇中和滇东的西爨文化。隋唐以后爨文化又西移洱海地区，形成南诏文化和大理文化。以上几种文化是云南文化的主流。它们之间有着纵向传承和横向交流的关系。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三千年来大理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周围是云南文明的发祥地

人类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创造出来的。中国文明的多中心不平衡发展，在史前文化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特别在云南延续时间最为长久。云南旧石器文化的超前与滞后，可以从1965年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距今170万年或50万~60万年的元谋人^①和1986年12月至1987年1月云南省博物馆、保山地区文物管理所、保山市博物馆人员在保山县蒲缥河北岸塘子沟发现距今7000年旧石器晚期遗址得到说明。这是同云南处于过渡地带的地理环境和生态因子多而复杂的特殊条件分不开的。越是早期，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制约性越大。在新石器时代，文明是多中心的，往后黄河流域逐渐趋于领先地位，中华文明从多中心逐渐变成单中心，又向四周辐射。离中心愈远，影响越弱。在云南，古代文明是从洱海周围向滇池地区发展的。1973~1974年在洱海东部宾川县宾居镇白羊村发掘出土距今4000多年的原始社会稻作聚落，是云南迄今发现最早和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同类遗址在大理、祥云、洱源、云龙、剑川、鹤庆等地都有发现。^②早在1939~1941年，吴金鼎等曾对洱海西岸的佛顶、马龙等新石器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在洱海东岸金梭岛、鹿鹅山、大墓坪和五里桥等地发现了新石器和陶片。稍后于洱海的新石器文化是元谋县大墩子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约3500年到4000年。而滇池周围晋宁、昆明官渡等地的新石器遗址，其绝对年代上限不超过3500年。从白羊村、大墩子到昆明周围的新石器文化，都是以发育稻作的河谷和湖滨盆地为经济中心的文化，彼此之间有着共同性和连续性。

以黄帝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通过涵盖大部分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大溪文化进入云南。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长子青阳降居江水（长江上游），次子昌意降居若水（雅砻江）。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颛顼。今云南、四川藏缅语各族均盛行幼子继承制，不可能与此无关。考古发掘还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西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已南下经过巴蜀到达今云南腹心地区。大理马龙遗址的半地穴式房屋，与甘肃马家窑和西安半坡相似；白羊村和大墩子平地起建的土木结构房屋，甚至与陕西庙底沟和河南洛阳王家湾遗址接近，大理马龙遗址的陶器刻符与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寺洼文化类似；白羊村出土的带耳、带流、高颈的陶器属于齐家文化类型。在马龙峰下还发现华夏文化标志的陶鼎残足。与此同时，司马迁也注意到古越文化溯西江而上到达夜郎以西的滇东南以至滇西的情况，《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同师”在今保山地区。从1986年在保山塘子沟发掘出距今7 000年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来看，云南与东南沿海以至东南亚的文化联系已经很久了。

海门口到石寨山——滇文化的形成

真正的“文明”一词表示人类社会从氏族制度解体，进入阶级社会组织的历史阶段，也就是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在云南，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也出现了文明的萌芽。1957年在洱海北部剑川县海门口发现距今约3 000年的青铜文化遗址，相当于商代晚期，这是云南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文化。遗址出土铜器有14件，其中9件是青铜器，有铜钺、斧、镰、钩、凿、锥、针、镞等。还有人工栽培的粳稻。出土石器农业生产工具达150件之多。海门口遗址标志着洱海地区新石器文化向青铜器文化的过渡，由原始公社跨进了阶级社会的大门。在以后发掘的剑川沙溪东周墓葬中，也出土一些青铜器，可见滇西一带是云南古代制造铜器较早的地区。1963年，在祥云县云南驿大波那发现战国中期距今约2 350年的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内有巨木叠组的井干式结构的椁室，椁内有一具长达2米由7块铜板组成的铜棺。棺内铜器有锄、铤等农具和一些纺织工具；兵器有矛、剑、啄、钺、镞等；生活用具有釜、杯、尊、勺、豆、匕、箸等；乐器有铜鼓、葫芦笙、钟等。棺内有一面象征权力的铜鼓和一根铜权杖，推断墓主人不仅是一个奴隶主，而且是当地农耕民族的政治领袖。^④1975年、1976年，在楚雄万家坝出土早于祥云的春秋至战国中期的墓葬79座，其中28座有随葬的生产工具、兵器等，出土青铜农具达147件。商周青铜器多为兵器、食器、酒器、礼器。青铜农具很少。而云南墓葬中出土青铜生产工具特别是农具很多，说明农业生产已经摆脱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真正过渡到标志生产力发展新水平的青铜时代。其中相当于春秋时期的第一期墓葬出土青铜短剑和铜矛接近洱海地区，早于祥云大波那遗址。万家坝出土5件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铜鼓，还出土一套羊角纽编钟，两者都是用以标明奴隶社会中奴隶主身份等级的器物。从万家坝和大波那出土的铜鼓、编钟和权杖，证明滇洱之间已出现国家雏形的组织。《史记·秦本纪》说：“（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丹、犁臣蜀，……武王元年（公元前310年）……伐义渠、丹、犁”。按张守节《史记正义》云；丹、犁，“二戎号也。臣服于蜀。蜀相杀蜀侯，并丹、犁二国降秦，在蜀西南姚府管内，本西南夷，战国时属滇国，唐初置犁州、丹州也。”丹、犁在姚州境内，即今祥云、楚雄一带，大波那和万家坝墓主距今2 300~2 500年，相当于秦惠文王、武王之时，或即

丹、犁二国之王。

1955~1960年,在晋宁石寨山进行了4次发掘,出土文物4000余件,其中青铜器2000件以上,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等;1972年,在江川李家山发掘和清理古墓27座,出土文物1300余件,与石寨山遗址属于同一类型。大量出土文物表明,司马迁在《史记》中所称的“滇楚”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使用青铜的镰、锄、斧等农具,主要劳动力是妇女,种植稻谷,不知牛耕,生产上处于锄耕农业阶段。畜牧业也较发达,家畜有牛、马、猪、犬、山羊、绵羊,牛的数量最多,还从事捕鱼,捞螺蛳和狩猎。手工业能制造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漆器、皮革、纺织品和陶器,青铜冶铸业最为发达,铜锡配合比例恰当,工艺水平很高,青铜器表面的鎏金、错金、镀锡或镶嵌玉石,十分精致和美观。一些兵器及其他器物上附饰有立体或半立体的人物和动物形象。七件贮贝器上塑铸有复杂的人物活动场面,表现人们从事战争、祭祀等活动。人们盛行集市贸易,并与四川等地交往,输入丝织品、铜镜、弩机等,输出牲畜和畜产品,卖出奴隶“滇僮”、“楚僮”。^⑤作为货币的家畜是牛,从南海传入的外来交换品则是海贝,有大批海贝放置贮贝器中作为随葬品。青铜器上的人物图像表明,滇池地区已进入比较发达的奴隶制,出现奴隶主贵族、平民、奴隶三个阶级。奴隶主不劳动,指挥战争和祭祀,平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是生产和贡赋的主要承担者。奴隶主要来自战争中的俘虏。一件贮贝器上铸有十几个女奴在一个女奴隶主监视下进行纺织。三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青铜器,铸有以人为祭,有一次共杀4人。^⑥以石寨山为代表的青铜文物,外形对称匀整,花纹精致繁褥,表明云南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阶段。

从海门口到石寨山,贯穿着一条从初期青铜器文化逐步发展到成熟的青铜文化的内在联系,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例如,刃部稍宽大的青铜斧与平面呈梯形的石斧形状相类似;青铜圆刃钺可以追溯到海口口的红铜钺,等等。不论以母系社会为标志的云南新石器文化或继起的以奴隶社会为标志的云南青铜器文化,都显示出一条从洱海周围经楚雄地区向滇池地区发展的线索。所有上述新石器和青铜器都分布于湖滨河谷平坝地区,这种文化的主人是“椎髻、耕田,有邑聚”的“靡莫”^⑦或“靡莫之属”。^⑧

石寨山青铜器文化的上限为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史载庄蹻率领楚国农民起义军数千人到达滇池,已是战国末年。^⑨是时滇池地区农业和手工业已有一定的发展,“靡莫之属”的“滇楚”人已在滇池周围坝区开垦出“肥饶数千里”的土地。庄蹻及其从人带来了先进的荆楚文化,但他们不能用暴力改变滇池地区正在上升的奴隶制度,而只能“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虽然如此,云南青铜文化中已有不少器物如靴形铜斧、宽刃短铜剑等在湖北都有出土。《楚辞·天问》中“水滨之木,得彼小子”与《华阳国志·南中志》(亦见《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九隆神话”相类似。庄蹻势力向滇西发展,故有“自夜郎滇池以西,皆庄蹻之裔”的说法。^⑩今之楚雄亦称“威楚”,当与楚人西迁有关。唐代宗大历元年立的《南诏德化碑》说,阁罗凤之弟“诚节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蛮书》卷五说,长沙指白崖城南20里的“蛮子城”。碑文又说:“候隙省方,驾憩于洞庭之野”,洞庭实指滇池。这都说明滇楚关系是很密切的。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击灭与滇王“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在云南设立益州郡,“以其故俗治”,^⑪令滇王复长其民,因而以石寨山为代表的滇文化,在西汉时期得以继续发展。但是,随着郡县制度的加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得其所欲”,^⑫四川铁器大量进入云南。早在大波那和万家坝遗址中,就出现豆、匕、箸和编钟等中原器物。石寨山遗址中除了西南民族固有的乐器如铜鼓、葫芦笙、铜锣等外,还有从巴蜀传来的鐃于和编钟(共6枚,大小递减)。青铜器图像所表现的舞蹈丰富多彩,有类似今天滇西

北彝、白等族的“锅庄舞”，也有类似今天傣族的孔雀舞，还有羽舞、盾牌舞等。遗址中纯汉式的器物也不少，如铜镜、弩机、釜斗、钟、釜、熏炉、各种钱币和汉印，除著名的“滇王之印”外，还发现“胜西印”和“王牢(?)私印”。江川李家山也发现“李德”、“黄义印”、“寿之人”汉印三方。经过新莽时滇池地区僰人大起义和文齐的治理，东汉时期汉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明帝时益州太守王阜在滇池地区“兴起学校，渐迁其俗”。^⑩昭通地区发现的《孟孝琚碑》记载：“孝琚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说今昭通地区“其民好学，多士人”。当时汉文化主要是通过宜宾到昭通进入云南的。如朱提（昭通）、堂狼（会泽、巧家）洗常以双鱼为图案，《孟孝琚碑》上端残缺，周围有龙纹及鱼纹，与内地常见的“四神”图案中的龙龟书法一样。“梁堆”出土的花砖和一些雕刻，都属于内地风俗。总之，到了东汉时期，以石寨山为代表的滇文化，除铜鼓外，几乎荡然无存了。滇文化的断裂和滇王国的消亡是和石寨山青铜文化的衰落分不开的。

西爨到南诏——云南文化中心的西移

由海门口到石寨山的滇文化基本上是云南土著民族的文化，其中既吸收了中原的氏、羌、巴蜀、荆楚和百越文化成分，又吸收了东南亚和南亚文化成分。从东汉开始，在以滇池和洱海为中心的内地坝区，东来的汉文化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云南的文化中心从滇中向滇东发展。东汉后期南中大姓崛起，其中与楚同姓的南中“方土大姓”爨氏在古滇国故地（今晋宁县）形成势力，其代表人物爨习于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任建伶（今晋宁县昆阳）令，^⑪后降蜀官至领军。唐樊绰《蛮书》卷六云：“晋宁州（今晋宁县），古滇池故地也。……西爨王墓，累累相望。”滇王墓葬与西爨王墓葬俱在晋宁县境，滇王式微而系出于“玁”的爨氏兴起，二者之间当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自爨习以后逐渐发展，至七世祖爨琛“事晋为南宁州太守，属中原乱，遂王蛮夷”。^⑫西爨继滇国之后，兴于汉魏，盛于晋宋，擅命于齐梁，窃据于隋唐，独步八代之间，绵延达五百年之久，在云南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它在中原分裂战乱中保持偏安南中的局面，未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扰，使两晋时期濒于残破的云南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北周时南宁州“户口殷实，金宝富饶”^⑬到了唐代，今曲靖以西的西爨地区（坝区）已是“邑落相望，牛马被野”。^⑭其次，西爨统治者大量吸收汉文化，促进各民族的融合。史载西晋太安元年（公元302年）的宁州是“南中形势，七郡斗绝，晋弱夷强”。^⑮过了170多年，经过东晋战乱，南齐初（公元479年）的宁州（今云南）仍是“道远土瘠，蛮夷众多，齐民（汉人）甚少”，^⑯而仅仅过了100年，到了北周末（公元581年）的南宁州，已是“其地沃壤，多是汉人”。^⑰上引“汉人”指“西爨白蛮”。汉晋时期入滇的汉人，多融合于爨氏，^⑱即后来的“西爨白蛮”之中，同时也促进了“西爨白蛮”的汉化。再次，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前后的宁州战乱，引起滇东包括叟人在内的编户屯民大量迁往滇西，^⑲西爨势力也继续随之向洱海地区发展。

隋唐之际，洱海地区分布着与“西爨白蛮”同族属的“河蛮”和乌蛮“六诏”，前者居住于洱海周围的坝区，后者主要居住于山区和半山区。史载唐初“河蛮”的社会情况是：“松外诸蛮，大唐贞观末为寇，遣兵从西洱河讨之。其西洱河从嵩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赵、李、董为名家（《新唐书》作贵族），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言语虽小讹舛，大

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自夜郎滇池以西，皆曰庄蹻之余种也。其土有稻、麦、粟、豆，收获亦与中夏同，而以十二月为岁首。……”^②这里所记居住于今大理太和至喜洲一带的“西洱河蛮”，“自云其先本汉人”，说明当时已蜕变为土著民族，可与“皆曰庄蹻之余种”相印证。庄蹻以后的南中大姓都是少数民族化了的汉族和汉化了少数民族。这是因为民族既是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又是不断变动的实体。《王仁求碑》说：“太伯逃吴，文身之风既习；少卿降虏，毳幙之化无违。”说明明代以前迁来云南的汉人，大都“变服从其俗”，“西洱河蛮”大姓，多是少数民族汉化或汉族少数民族化。他们汉化程度颇深，显然是以《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为代表的西爨文化向洱海地区发展的结果。又《新唐书·南蛮传》说：“西洱河蛮，亦称河蛮”，但“河蛮”也包括居住于洱海东部今大理凤仪、宾川一带的“东洱河蛮”。后“西洱河蛮”北徙于剑、共诸川（今剑川至鹤庆、丽江一带），而“东洱河蛮”则未徙。《蛮书》卷五说：“渠敛赵（今大理凤仪），本河东州也。……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河东即洱河（海）之东。河蛮分布于洱河东西，各有大姓首领。据《爨龙颜碑》碑阴，西爨区域东抵贵州西部；直到唐初还包括洱海地区及其北部的“松外诸蛮”在内^③，比《蛮书》卷四所说从石城（曲靖）到龙和城（禄丰大腰站）的西爨区域大得多。隋史万岁击西爨，先到洱海地区，再到滇池，可以为证。天宝年间南诏崛起，向东发展势力，西爨统治区域相对缩小。但洱海周围平坝地区的居民在族属和文化上属于西爨白蛮。当时东西洱河蛮的社会经济已达到“与中夏同”的水平。

关于六诏，《新唐书·南蛮传》说：“爨蛮西，有昆明蛮，亦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逐水草而居，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阵亡，胜兵数万。”“昆明蛮”为六诏前身，即《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昆明”人。唐初仍从事游牧，正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主义阶段，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较河蛮落后。

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遣梁建方从西洱河击“松外蛮”（今永胜、华坪一带），在击败为首的部落贵族双舍后，派人招降河蛮，先后来附者七十部，十万九千三百户，连十分惧怕想上船逃走的西洱河首领杨盛，也被说服投降。^④又贞观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领杨同外、东洱河大首领杨敛、松外首领蒙羽皆入朝，授官秩。^⑤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西洱河大首领杨栋归附。^⑥当是这次战役的结果。在稍前的永徽初年（公元7世纪中），左领军将军赵孝祖征“白水蛮”，遂至大小勃弄（今祥云县），斩小勃弄酋长段盛，执大勃弄首领杨承颠。^⑦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洱海地区首领董期率所部二十余万户内附。^⑧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监察御史李知古又击“西二（洱）河蛮”。^⑨唐初“河蛮”特别是“西洱河蛮”受到唐王朝的多次重大打击，势力遂衰，六诏乃乘时而起。

六诏并存时期始于唐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至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先后50年。六诏中的越析诏是今纳西族先民，其地在今宾川县宾居街，隋初即已出现。次为南诏，在巍山县南，自言为哀牢之后，贞观初始居蒙舍川。蒙嵩诏地在阳瓜州，《王仁求碑》载阳瓜州刺史蒙俭，当即蒙嵩诏主。浪穹诏在今洱源县。武后永昌元年，傍时昔以二十五部去吐蕃降唐，任浪穹州刺史。《蛮书》卷三载，“遼賧，一诏也，主丰咩”。“施浪，一诏也，诏主施望欠。”初居邓川，后为浪穹诏所夺。后施浪诏迁于浪穹东北蒙次和山东北一带。“浪穹诏丰时、丰咩兄弟俱在浪穹，后丰咩袭邓賧居之，由是各为一诏。”

南诏是以“乌蛮别种”^⑩贵族和白蛮大姓（贵族）联合建立的政权。据《南诏德化碑》题名，这个政权中的清平官、大军将，白蛮占多数，还有后来的三十七部和今傣族贵族首领。在南诏出现之前，洱海南部地区（今弥渡、巍山、南涧一带）为白蛮张乐进求统治的“白子国”（亦

称“白国”、“白崖国”、“云南国”、“建宁国”等)。据胡蔚《南诏野史》“建宁国”(不是东晋成帝咸和八年李雄陷宁州建立的建宁国)云:“后汉诸葛武侯南征,……乃封白子国王仁果十五世孙龙佑那为首长,赐姓张氏,于白崖筑建宁城,号建宁国,立铁柱……后张龙佑那仍迁国澄江,传三十二世至十七世孙张乐进求,唐太宗己酉贞观二十三年,封为首领大将军。后见蒙舍川蒙细奴逻有奇相,遂妻以女,逊国与之。”这段记载中显然有附会成分,但也有合理因素。东汉末年,洱海地区“有上方下方夷,……土地有稻田畜牧,但不蚕桑。”^②“上方夷”是分布于山区的乌蛮,即后来的六诏。“下方夷”是分布于河谷坝区的白蛮,即后来的“河蛮”。当时洱海地区附属蜀的永昌郡,诸葛亮虽不到滇西,但在已具备设郡条件的洱海地区新设立了云南郡(治云南县,即今祥云县),实行土流两重统治,“即其渠帅而用之”,^③封当地酋长龙佑那为首长,以吕凯为云南郡太守。现存日本京都有邻馆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④(以下简称《画卷》)曾绘有白子国为其邻近的南诏取代的故事,可为佐证。《画卷》中记载唐初洱海地区的“白蛮”和“乌蛮别种”同属于一个部落联盟。据上引张乐进求妻细奴逻以女来看,当是亲属部落联盟。这个联盟以白子国王张乐进求为盟主。《画卷》中有文字说明:“按《张氏国史》云:云南大将军张乐尽(进)求、西洱河右将军杨农栋、左将军张矣牟栋、巍峰刺史蒙逻盛、勋公大部落主段宇栋、赵览宇、施栋望、李史顶、王青细莫等九人共祭铁柱”。这九人中,有八人按姓氏当为白蛮首领,唯巍峰刺史蒙逻盛一人为乌蛮别种。时蒙氏势力强大,张乐进求乃让盟主之位位于蒙逻盛。(按《画卷》以兴宗王蒙逻盛为中心,而《南诏野史》则以其父细奴逻为中心。《画卷》出自唐末五代人手笔,在《野史》之前,故从前说。)

由于铁柱会盟中白蛮大姓人多势众,被推为盟主的蒙逻盛不得不重用白蛮大姓。蒙逻盛于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立,以白蛮大姓张俭(建)成为相。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盛逻皮立,遣张俭(建)成入朝于唐。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皮逻阁在唐朝支持下兼并其他五诏,迁都太和城,建立了南诏。统一云南的阁罗凤,立于唐玄宗天宝七年(公元748年),以白蛮段俭魏(段忠国,见《南诏德化碑》碑阴)为清平官、大军将,辅助南诏,先后大败唐将鲜于仲通和李泌于洱海周围,为南诏开国功臣。天宝战争是唐王朝推行错误的民族政策造成的。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阁罗凤在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立《德化碑》,记述被迫反唐的苦衷,对国人说:“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唐非本心也。”唐代著名政治家李泌说:“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⑤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和唐重修和好。

据文献记载,南诏历代君主的清平官和大军将,十之八九是白蛮贵族。唐白居易《长庆集》卷四十《与南诏清平官书》云:“敕南诏清平官段诺突、李附览、爨何栋、尹辅酋、段谷普、李弄傍、郑蛮利等”。白蛮多冠汉姓,其名字与汉族基本相同,“乌蛮别种”蒙氏则实行冠姓父子连名制。书中具名除郑蛮利(郑回)为汉族外,都是白蛮。又《文苑英华》卷四百七十《与南诏清平官书》云:“敕段宗膀、段酋琮、独栋、杨迁、赵文奇、蒙善政、李守约等……”七人中蒙善政是乌蛮别种,独栋族属不清,其余五人为白蛮。又隆舜时以赵隆眉为宰相,以段义宗、杨奇鲲为清平官,都是白蛮。白蛮是南诏的主体居民以及赋税和兵役的主要承担者。白蛮大姓先后帮助蒙氏统一六诏,兼并西爨。而南诏的主要敌人是其他乌蛮五诏和后来北迁依附吐蕃的乌蛮“三浪”,后者一直是南诏的心腹大患。乌蛮别种和白蛮是两个民族,正如司马迁说的“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故意合则胡越为一家,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则骨肉出逐不收,(丹)朱、象、管、蔡是矣。”^⑥所谓“意合”即为建立统一云南全境联合政权的目标一致。由于白蛮汉化程度较深,生产水平较高,南诏不仅依靠洱海周围之白蛮统一洱海地

区,而且“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万户于永昌城。乌蛮以言语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日用子孙今并在永昌城界内”。^⑤“永昌城”包括洱海周围地区,而“永昌城界内”则限于今保山地区。所谓“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⑥《蛮书》称“六诏并乌蛮”,而《新唐书》却说南诏是“乌蛮别种”,当与东爨和六诏中的其他五诏有所区别,表现在其语言接近白蛮。这是古藏文写本称南诏为“白蛮”的原因。^⑦由于蒙舍语音接近白蛮,不能不是它迁徙西爨的原因之一。世隆之子隆舜,自号“大封人”^⑧,改国号曰“大封民国”^⑨“封民”即“僰民”或“白人”。隆舜亦作法尧,改用效法尧舜的汉族名字。南诏王族后期已经完全白蛮化了。

南诏上承西爨文化,下启大理国文化,其政治制度和礼乐风化极力模仿唐朝。早在南诏建立前的唐武后圣历元年(公元689年)所立《王仁求碑》(在今安宁县大石庄),碑文中天、地、国、日、月、圣等字采用了武则天颁行字体。王仁求是白蛮,曾为河东州(今大理凤仪,亦说在安宁附近)刺史,碑文说他“开夜郎之道,绥哀牢之圉”,自姚州以西二十余州“俾睦其德”,可见唐代文化已深入到洱海地区。

南诏统一云南和迁徙西爨使云南政治经济中心西移,促进了洱海地区科学文化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南诏大兴水利,开发“殊为精好”的山田,做到“水旱无损”。公元9世纪30年代,在大理筑了“横渠道”,灌溉东郊和城南的田地,称为“锦浪江”;修建了点苍山玉局峰顶的“高河”水利工程,将山水汇合为池,然后下流平原,引导十八溪的水灌田。^⑩据说唐朝罗时所创建的邓川罗时江的分洪工程,增加了灌溉面积。^⑪南诏根据云南气候实际,制定“以寅为正,四时大抵与中国小差”的历法,并且掌握辨别晴雨和风力的气象知识。其次,南诏的冶金业很发达,《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二段中的犁、六段中的皮囊状物即“囊”,作鼓风冶铁之用;所制铁刀剑有“郁刀”“浪剑”和“铎鞘”,“所击无不洞”。^⑫出土于城址的“南诏有字瓦”上的文字,一部分借汉字增损笔画,另一部分用汉字为符号记白音,这就是南诏时期出现的“白文”。

南诏的重要碑刻有《南诏德化碑》,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为王昶在大理太和村访获。碑高3.9米,宽2.4米。正书,残泐甚多。碑文反映了南诏的社会情况,如“西开寻传,禄郛出丽水之金”“建都镇塞,银生于墨嘴之乡”“越啖天马生郊,大利流波濯锦”,说明南诏金银开采和养马业、丝织业的发展。碑文所述南诏初期历史,可补文献之不足。碑文为白蛮王蛮盛作,唐代著名文人杜光庭书。全文抒情似行云流水,跌宕生姿,一气呵成。书法秀整,有北周北齐遗法。现存盐津县豆沙关山崖上的《袁滋摩崖》,范围约为高0.51米,宽0.27米,共8行,行3~21字,左行,正书,末行题名篆书。摩崖立于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先是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先遣崔佐时与异牟寻在苍山结盟,共同击败吐蕃于神川。袁滋一行奉唐廷命册封南诏,六月从长安出发,九月经过石门,摩崖刻石留念,十月末到达今大理。^⑬《新唐书·袁滋传》称袁滋“工篆隶,有古法”。此碑为唐朝和南诏关系史上的重要资料。

南诏贵族庄园白崖城,周迴四里,前厅后院,修廊曲院,备极奇巧。^⑭著名的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千寻塔)高达69.13米,凡16级,十分雄伟。还有建于南诏末期的弘圣寺塔和佛图寺塔(又名蛇骨塔)。昆明今东寺街的西寺塔和东寺塔,塔砖有梵文及符咒之类,当是南诏末年或大理国初年所建。大姚城西白塔,相传为唐时西域蕃僧所建。南诏后期修建的佛塔很多。弥渡县城西南诏铁柱,阳文正书“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建极是蒙世隆年号,建极十三年为公元872年。巍山垆圩图南诏宫殿遗址出土的方砖、瓦当和滴水,其图案形式和长安兴庆宫遗址出土物极为相似。五华楼为晟丰佑所建,以会西南夷十六国君长。楼方广

百尺，上可容万人。

南诏时期，有不少人士到内地学习，内地流寓文人郑回教授子弟，出现了一批被称为“高手”的能诗善文的文人，其收入《全唐诗》、《全唐文》的作品被称为“佳作”。史称南诏王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寻阁劝的诗见于记载的有《星回节游避风台》，清平官赵淑达有和诗一首，诗中有白蛮俚语“波罗”（虎）、“毗勇”（野马）等。清平官赵淑达的《题大慈寺芍药》诗有“繁影夜铺方丈月，异香朝散讲筵风”。^⑦清平官杨奇鲲是当时大理著名诗人，其《途中诗》有“风里浪花吹更白，雨中岚色洗还清”。^⑧都传为佳句。南诏骈文、散文亦有佳作，如大中初南诏朝献质问唐朝缩减南诏派往成都学习名额，有“一人有庆，方当万国而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之有费”之语。

南诏的音乐舞蹈也很出色，凤伽异曾由长安带回唐朝赐给的龟兹乐队。这时南诏也有了自己的乐队，创编了著名的《南诏奉圣乐》，在唐宫廷表演，被列为唐代音乐十四部之一。^⑨南诏的《狮子舞》也于此时传入中原地区。南诏时期还先后传入《骠国乐》和《弥臣乐》等。

有故国（唐宋）遗风的大理文化

公元738年统一云南的南诏于公元902年覆亡。经过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3个王朝30多年的短期统治之后，白蛮段思平于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以“减税粮”、“宽徭役”^⑩为号召，讨灭大义宁国主杨干贞，建立大理国，基本承袭南诏版图，辖八府、四郡、三十七部。传22世，共318年，大体相当于宋朝的起讫时间。

史载段思平“尽逐杨（干贞）氏奸臣，罪大者明正罚爽，表暴贞良，更易制度，损除苛令。”^⑪实行阶梯式层层分封的“世官世禄”的封建等级制度。大理政权与南诏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基本上不对外扩张，与宋王朝和邻近国家友好相处。这与其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封建领主制和崇信佛教有一定的关系。

大理国的社会经济文化较之南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冶铁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史载“云南刀，即大理所作，铁青黑沉沉不蚀”，^⑫被形容为“吹毛透风”。^⑬包括农具在内的“器械精良”，^⑭得以兴修水利，开垦大片农田。杨佐路过姚州时，认为其地农业生产水平“略如东蜀之资（中）、荣（县）”。^⑮元初郭松年过祥云时看到青湖“灌溉之利达于云南（祥云）之野”，白崖（弥度）则是“居民褊集，禾蕪蔽野”，而凤仪有“神庄江贯于其中，溉田千顷，以故百姓富庶，少水旱之灾”。^⑯其次，大理的手工艺品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用象皮制造的甲冑，“坚厚与铁等”，^⑰刀箭不易穿透。披毡也很有名，“其上有核桃纹，长大而轻者为妙”。^⑱彩漆器皿闻名遐迩，而漆雕技术尤为突出，所雕刻的漆器“宋剔”，传到明代，被视为珍品。^⑲直至元明两代，封建王朝宫廷里所用的工匠，还不断取之于云南，以致“滇工布满内府”。^⑳再次，大理的畜牧业也很发达，并与宋王朝和邻近国家进行贸易。“大理马”闻名全国，源源输往内地，成为宋王朝抗击金兵的战马来源之一。《宋史·兵志》说：“每择其良赴三衙，余以赴江上诸军。”所谓“三衙”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五说：“乃命（广西）经略司，以三百骑赐岳飞，二百骑赐张浚，又选千骑赴行在”。岳飞于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以后，即投入抗金战争，其战马一部分来自大理国。《岭外代答》卷六说：“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齎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贾以贲绵缁、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于是译者平价交易。”与此同时，大理与缅甸、波斯、昆仑等国都有贸易往来。大理城和

鄯阐城已形成重要商业城市。元初马可波罗到昆明时说：“城大而名贵，商工颇众。”^⑧基本上可反映大理国后期昆明城的情况。

佛教是大理国的宗教信仰。民间除信仰相当于社神的本主外，^⑨上自国王，下至平民，普遍信仰佛教。南诏后期（8~10世纪）最初从西藏、四川、西北等地传来的是“婆罗门”和瑜伽密宗。由中原传入的大乘华严宗等流派也有一定影响，但不能同密宗相抗衡。密宗的僧人称为“阿闍梨”（亦作“阿叱力”），所以又称“阿闍梨教”。相传“阿闍梨教”是观音化身的梵僧传入云南的，以故大理各阶层人民特别崇拜观音。人们取名多用佛号，习见的如高观音明、陈观音婢、张观音海等。民间不论贫富，家家都有佛堂。密宗作为最流行的教派又分两类，居山寺者曰净戒，居家室者曰“阿闍梨”。相传段思平不断建寺，铸佛万尊。大理国虽未实行政教合一，但佛教与政权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很多官吏都从“师僧”中选拔。大理国21个国王中就有9人避位为僧。密宗的最高法师被封为国师。清平官等要职常从寺庙僧人中选任。官场失意者，也往往为僧。大理国初期年年建寺，后来专权的高氏也建寺不已。大理国也从内地大量吸收儒家文化，常常通过官方及民间渠道学习中原文化。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大理国主派遣使臣高泰运到宋廷求书，“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⑩大理国利贞二年（公元1173年），大理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到广西横山买马，开列的购买经书名单有：《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百家书》等。^⑪大理国各阶层诵读儒家经典蔚然成风。大理建国开始即实行开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读书者。由于人们笃信佛教，逐渐形成佛儒合流的趋势。“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出家为僧和诵读佛、儒经典，已成为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大理国的道教徒也读儒经，但其势力远不如佛教和儒教。

大理国的文化艺术也很发达。史学方面有《白史》、《国史》等书。民歌和传说故事，是白族文学的主流。舞蹈《踏歌》起源很早，各个时代利用这种形式歌唱万物起源和英雄事迹。《白族调》是“三七一五”（前三句七言，后一句五言）的格律诗。在《白族调》的基础上形成《本子曲》，宋元以后演变为说唱曲艺的《大本曲》，又发展为《吹吹腔》，已具有戏曲的萌芽。对口山歌的流行也很早。

大理国时期的雕刻绘画中，佛教造型艺术最为突出，著名的有剑川沙溪石宝山石窟。年代最早的佛像制作粗陋，而那些窟深、像多、花纹繁缛者，其制作年代不能早到大理国以前。这里分布着16处石窟和摩崖造像，包括石钟寺区8处，狮子关区2处和沙登村区5处。第一窟的“阿娑白”左右各有佛像一尊。龕顶墨书题记中的“盛德四年”的“盛德”，为大理国段智兴年号。盛德四年为公元1179年。第二窟为“剖腹观音”。第三窟中间供佛一尊，两边有“八大明王”，其两边又各有天王像一尊，佛座之下有18个动物浮雕。第四窟有3龕，中雕罗汉像，俗称“愁面观音”，旁有二坐像相对。第五窟中雕释迦佛，左有文殊，右有普贤。第六窟与第五窟相连，雕一坐佛。第七窟雕王者像，当即阁罗凤，两侧坐者为清平官、和尚并其弟阁陂和尚，女子则为其妃白氏。第八窟亦雕王者像，当是异牟寻，其右侍者三人，其左侍立二人，左右两侧各坐一人。第九窟雕一人，束带，着靴，耳戴环，衣后幅甚长，旁镌“波斯国人”四字。第十窟雕一观音像，前有一犬。第十一窟亦为王者像，可能是细奴逻及其全家。第十二地点为石上浮雕，是观音带犬化缘。第十三地点称夹子寺，在山崖夹缝两边各雕一天王像，面南者为广目天王，面东者为多闻天王。第十四地点在岩石正中雕一佛像。第十五窟为浅窟中雕佛的立像，左右各有四塔，右上角有一小龕，内雕一佛骑象。此窟为大理国时期造像。第十六窟亦为浅窟，共6龕，大部雕有佛像，题记为“天启十一年（公元850年）”，“天启”为南诏王丰佑年号。除上列16窟

或地点外,尚有石虎、人头兽身等零星雕像及浅浮雕。第一窟原为女性生殖器崇拜,又与后来的佛教混合。石窟16窟大部分是佛教题材。第七、八、十一窟3窟为本主崇拜,属于晚期。3窟中各类人物的服饰器物,与文献记载一致,如武士身上所系的腰带,即《蛮书》卷八所说的“佉苴”,今白语仍称腰带为“佉苴”。两窟王者身后有人持剑或佩剑,当是“铎鞘”或“南诏剑”之类。

在安宁县城东面的5公里的法华寺石窟,其风格与剑川石宝山石窟相同。有一部分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雕刻。第一区有2龕,左龕为观音足踏莲花,右龕菩萨盘膝坐于莲花座上。第二区由18个小龕组成,大多数一龕一像。第三区共3龕,左龕佛像已不存。中龕佛像一腿高跷,双手抚膝,颇为生动。右龕有一牵象者。第四区左龕佛像残脱,右龕塑一卧佛。

剑川金华山天王像在城西约一公里,俗称“石将军”。像雕于一块大岩石上,中为多闻天王,高约6米,一手持杵,一手托塔,旁有两个力士侍立。晋宁天王像在晋宁城西5公里处,亦称为“石将军”,雕于岩壁上,高约6.5米,右手持三尖杖,左手扶腰而不托塔,塔在左肩上方云气之中。此像亦为多闻天王。以上二像的年代可上溯到南诏末期或大理国初期。

传世佛像有玉石的,有陶瓷的,个别还有金银质的,大多数是铜制,其上或加鍍金。传世佛像中以观音为最多。其年代较明确的是大理国王段政兴(公元1148~1171年)为其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易长为佛号,与“观音”同,在姓与名之间插一佛号是大理的普遍风俗)所铸的观音像。美国人查平(H·B·Chapin)的《云南观音像》除段政兴铸观音像外,还有几件无铭文的观音像。这一时期较著名还有崇圣寺的“雨铜观音”,相传铸像时天雨铜以助其成。除铜佛像外,还有铜本主像传世。

大理国时期最著名的绘画是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卷》,被称为“南天瑰宝”,现收藏于台湾。此画全长10丈,134开,画着628个面貌各异的人像,设色涂金,笔法工巧生动,不亚于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风格。它既反映了中原艺术对云南的影响,又具有白族人民传统的民族特色。全画分3段,前段绘大理国王段智兴(公元1172~1200年)及男女扈从;中段绘诸佛菩萨、天龙八部等;后段绘天竺十六国王。画后有僧侣妙光题跋。^⑥此画不仅对研究佛教历史和艺术有重要价值,表明禅宗在大理国时期已传入云南;而且对研究大理历史和社会生活也有参考作用。如一百零三开所绘的密宗普遍信仰“十一面观音菩萨”,左右侍者4人,下15人即南诏十三王,加上细奴逻之妻和逻盛之妻。所绘南诏诸王供养的根据是:相传天宝之战中,“十一面观音”曾助南诏击败唐兵。诸王服饰与《中兴二年画卷》和剑川石宝山诸窟相同。又画首利贞皇帝及后妃、侍从的服饰,也是研究大理宫廷生活的有用资料。此画观音形象有十几种,还夹杂有不少当地的神话传说。^⑦

大理国时期还盛行壁画,各地寺宇中均有“殿像壁绘”。

大理国时期的重要碑刻有《大理国三十七部会盟碑》,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出土于曲靖,今存曲靖第一中学。碑高1.25米,广0.58米。碑文共11行,行13字,左行,正书。碑尾有题名8行,行5~15字,右行,行书。此碑立于明政(大理国五代国王段素顺年号)三年(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记述大理国征服今滇东三十七部之事。碑中奇字甚多,有待诠释。

《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在楚雄城西20公里,今尚存。摩崖范围为高2米,宽1.5米,上刻螭纹,共25行,行46字,左行,正书。此碑为颂扬大理国高量成而作。量成事迹见于《南诏野史》等地方史料,与碑文相符。量成是篡大理国王位而建立“大中国”的高升泰的曾孙,其祖高泰明还政段氏,其父高明亮(量)封于楚雄。段和誉时(公元1109~1147)量成曾镇压三

十七部叛乱。后于段政兴时让位其侄寿贞，退居楚雄终老，所居为“德江城”。

《兴宝寺德化铭和稽肃灵峰明帝记》，原在姚安城西兴宝寺，今迁城内文化馆。碑高1.28米，宽0.77米，厚0.24米。有文2篇，一为《铭》，刻于碑之正面，最后6行刻于碑之右侧。共33行，行50字（第4、10行为51字），左行，正书。此碑颂赞高踰城光功绩及兴修兴宝寺之事。二为《记》，在碑之右侧，共8行，行50字，左行，正书。记高踰城光祀稽肃峰山神之盛典，有如中原封禅之礼。两文同刻于元亨三年（元亨为大理国王段智兴年号，元亨三年为公元1186年）。高踰城光亦高泰明之后，祖高明清，与封于楚雄的高明亮是兄弟，任定远将军，食邑在姚州，而常居鄯阐以镇守。1119年三十七部攻陷鄯阐，明清身亡，其后人世守姚州。碑称兴宝寺为南诏世隆时布燮杨楨于建极年间（公元860~?年）所始创。杨楨为白蛮，曾领重兵镇守姚州，“委佐兵机，抗蜀衡蕃”，碑文可补史缺。高踰城光为高踰城生次子，封居阳派，其地在今姚安县城之西，兴宝寺及稽肃峰都在这一带。撰文者杨才照，自称“释儒”，即“阿闍梨”教派的“师僧”。

《高生福墓志铭》于1935年出土于楚雄莲花池，今存云南省博物馆。此石作塔柱形，上有螭首，通高1.25米，中段四面刻字，共38行，行11~14字，左行，行书。高生福不见于文献记载，墓志铭说他是高智升另一子高升祥之后，《姚郡世守高氏源流总派图》（载《滇录》卷八）说，高升祥袭鄯阐侯，生一子曰祥明，生福曾祖名高祥坚，或为祥明兄弟辈。墓志说生福死于“仁寿四年”，亦曾“用为谋主”，当是大理国一个重要人物。“仁寿”为段智祥年号，起讫年代不明，当在公元1225年之后和1239年之前。

“昆明地藏寺经幢”在今昆明以经幢命名的古幢公园之内，寺毁幢存。幢高6.5米，八角形，通体石制，共7层，上六层雕佛和菩萨、罗汉以及楼阁、宫殿，最下层四角刻天王像，其旁刻梵文。座上有石八面，上刻《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大日尊发愿》《发四宏誓愿》及《造幢记》。其下为须弥座，上刻蟠龙纹。《造幢记》分刻3面，共62行，除首4行外，每行10字，正书，遇人名则书小字，大意说高明生早死子幼，布燮袁豆光求救于宋王（宋廷）、蛮王（大理国王），终于转危为安。经幢即为纪念其功绩而建。按高观音明、高明生父子当是高智升后裔中世守鄯阐的一支。《姚郡世守高氏源流总派图》记智升之曾孙有明生，袭鄯阐侯，当即此人。撰幢记者段进全，是大理国都城的“阿闍梨”教“释儒”。此幢记年代不明。^⑥

大理国时期的写本佛经是研究密宗“阿闍梨”教的唯一实物资料。这批佛经藏于今大理凤仪北汤天董氏“金盞宝刹”中，建国初即被云南省图书馆馆员周泳先发现。1956年，云南社会历史调查组进一步在宝刹中找到两大柜经卷，共约3000册左右，大部分是刻本佛经。年代最早的可以上溯到南诏末年，如《护国司南抄》卷一题记中有“安国圣治六年”，“安国”为郑买嗣年号。其中“保安八年”中的“保安”是大理国王段思廉年号（保安八年为公元1052年），“保天八年”中的“保天”是大理国王段正严年号（保天八年为公元1136年）。此外有元明时期云南人自刻的经书，有内地宋元时所刻而后传入云南的《思溪藏》、《普宁藏》、《碇沙藏》等。写经中有一小部分是明清时物，当系据大理经卷重抄。按大理国写经在宋代颇为著名。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大理国给宋朝的贡品中便有“金银书金刚经三卷，金书大威德经三卷”。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大理国李观音得等到广西横山市马，“擎送佛书，碧纸、金银字相间”。1925年罗振玉在天津曾见到大理国王段正严写的《维摩诘经》一卷。抗日战争期间，吴乾就又在大理发现《太和龙关赵氏族谱》一部，背面是大理国段智祥时写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末有《题记》，年代为“天开十九年”（相当于公元1221年）。值得注意的是，大理国的一些经卷，旁常有硃笔或墨笔批注，除少数注藏文者外，多以汉字为音符注出当地白蛮语言，当

是最早的“白文”，是研究“白文”的宝贵资料。^⑧

大理国与宋王朝和内地人民一直保持着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前引《维摩诘经》的《写经记》中说大理国相国公高泰明，即一度建立大中国的高升泰之子，奉遗命还国于段氏者。此写经是他为了赠送宋廷来大理国的使者而造。中有“愿中国遐邦从兹亿万斯年而永无隔绝也”之句。又前引大理商人李观音得等到广西横山买马求书，在求书函中写道：“……言声不同，情意相契。吾闻夫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两国之人，不期而会者，岂不习夫子之言哉！”并有所谓“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的诗句。宋代大理国向内地输出许多精美的工艺品和贵重药材，又从内地输入手工业品和汉文书籍。现存的《帝范》一书，是元代大德年间（1297～1307年）在云南所得，^⑨无疑是大理国保存下来的。公元10世纪末叶，四川农民起义军遭到宋王朝的镇压后，不少起义人员来到云南地区居住。^⑩公元11世纪，川西遭到了灾荒，汉族农民迁到金沙江以南的大理国地区，垦田种植，重建家园。杨佐应宋王朝成都路招募来大理买马的途中，还遇到这些汉族人民。^⑪大理国在保存其固有的民族文化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吸收内地汉族人民的科学技术和儒家学说，并通过民族形式把中原文化传播给云南境内其他各族人民。元朝初年郭松年来到大理时，在其所著《大理行记》一书中说：“故大理之民，数百年之间，五姓（蒙、郑、赵、杨、段）固守，……使传往来，通于中国（中原）。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云（言）为（行），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唐、宋）之遗风焉。”郭松年在蒙古忽必烈平大理国后不久到达大理，亲眼看到大理国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实际情况。白族知识分子早就能够纯熟地使用汉文，用汉文写文章诗词，在白族语言中保存了许多汉族古音词汇，如“江、河”二字，今白语音读如“工”“可”之类。这就为元代在云南建立行省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

元明清以来的大理文化

元代以后，大理文化逐渐融合于中原文化之中。特别是明代移民屯田，大批汉族迁入云南，改变了元代以来来自内地的汉族不断融合于白族之中的势头。明代以后，从曲靖、滇中到滇西楚雄一带平坝地区的白族，不断融合于汉族人民之中。元明清时期，由于全国政令统一和汉文化的大量传入，白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完全接轨。元朝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在中央设立“国子学”，在地方分别设立“路学”、“府学”、“州学”、“县学”，并在中央及地方分别设立“国子监”及“儒学提举司”，推行以儒学为主的文化事业。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赛典赤首先在云南开展尊孔读经和创建学校教育制度，在中庆路（昆明）、大理等地首建文庙，从此，“云南始知尊孔子”。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实行科举考试，“专立德行、明经科”，^⑫考试内容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学说在云南首次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与此同时，元王朝也大力宣扬佛教，大理的“阿闍梨”教仍有相当势力，由于云南已消除割据状态，大理国时期传入的禅宗得到迅速发展。筇竹寺《大元洪镜雄辩法师大寂塔铭》说：雄辩以“梵（白）人之言”讲《法华经》、《维摩经》20余年，可知禅宗首先在滇池梵人中传播，这与《张胜温画卷》中已有禅宗相符合。元代中后期，禅宗建寺颇多，洱海地区尤为盛行。明代以来，鸡足山逐渐发展为以寂光寺为主的八大寺七十一庵的规模。儒佛道三教有进一步合流的趋势。明清两代，由于“改土设流”和“改土归流”，封建文化教育随之深入基层。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诏命云南增设学校，县设书院，乡设乡塾。自此以后，科举出身的白族知识分